

# 亳文化研究的几点思考

张文禄

(亳州学院 教育系, 安徽 亳州 236800)

**摘要:**在安徽三大文化圈背景下探讨亳文化,必须要从理清亳文化的时空范围入手,要关注亳文化的精神内涵,拓展亳文化的研究内容,要勇于借助淮河文化研究已经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夯实亳文化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凝练亳文化独特的概念内涵,明确亳文化的研究方向,运用“三时段研究策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研究亳文化。

**关键词:**亳文化;地域文化;文化圈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21(2021)02-0059-06

文化是一个意域宽阔,内容丰富的概念。众多的人文社会学家从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给出了不同的文化定义,甚至一些自然科学家也试图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去阐释,可惜的是,至今还没有一个令绝大多数学者认可的定义。尽管各家各派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概念,但文化是一定区域内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结晶是共识。由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是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充分整合了各个地域文化要素、能够直观反映中华民族精神与特质的文化。中国地域广阔、自然环境各异,再加上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因而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是指因地理与自然环境差异,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文化。“在中国区域文化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历史因素始终是促成区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sup>[1]</sup>任何宏观现象都是由微观颗粒组成,文化依然。中国文化是各个区域文化精华的综合体,研究中国文化离不开区域文化,同样,每个区域文化又是由多个地方文化有机组成的,研究区域文化离不开地方文化。地方文化是区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生活在某一具体地域范围的人民所创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由上述可知,不管是文化、中国文化还是区域文化和地方文化,都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机融合而形

成的产物,它既是一种历史现象,又是一种社会现象。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越来越重视本民族的文化,各地区也相应地开始了区域文化的整理与研究。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地方文化的挖掘、整理与研究也被提上议事日程。亳文化研究应运而生。自 2010 年以来,亳文化研究日益升温,并得到了安徽省内史学界、文化工作部门、地方院校和地方文化研究者的高度关注。2017 年 8 月 26 日,安徽省亳文化研究会成立,开启了亳文化研究新的历程,2018 年 4 月 14—15 日在安徽省亳州市召开亳文化研究会研究规划发展座谈会。这两次高规格会议的召开为亳文化的研究指明了方向,也为长期从事亳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依靠。现在有关亳文化的研究成果已经陆续出现。但作为一项新的研究课题,亳文化研究尚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

## 一、亳文化的时空概念

### (一)安徽三大文化圈背景下的亳文化

文化圈理论形成于 20 世纪初的西方国家。“所谓文化圈,是指具有相同文化因素的区域。在这一区域中,有一个核心文化丛,由它向周边地区扩散一定数量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因素。不同程度接受了这种文化因素的地域,便形成一个文化圈。多个小

**收稿日期:**2020-12-29

**基金项目:**安徽省质量工程项目“精品线下开放教育课程中国传统文化”(项目编号:2019KFKC178);亳州学院重点科研项目“以传统家训文化推进皖北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项目编号:BYR2018B01)

**作者简介:**张文禄(1976—),男,甘肃民乐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民国史和地方文化。

文化圈在经过某个历史阶段的融合与发展,也可能形成一个大文化圈。”<sup>[2]</sup>“文化圈是一个地理上的空间概念,是指具有相同的文化特质、文化丛的众多文化群体所构成的区域……文化圈的提出有益于我们能更好地从宏观上把握人类文化的空间布局以及各个不同的空间单位的文化形态与特征,用实证资料来说明文化形态的起源、相似或差异”<sup>[3]</sup>。在文化圈理论的指引下,致力于安徽地方文化研究的学者,根据安徽地理位置、社会风俗、思想文化发展的演进情况,将安徽文化由北向南划分为渦、淮文化,皖江文化和新安江文化(或徽州文化)三个文化圈<sup>①</sup>,但三大文化圈并不能包罗安徽全省的文化类型,关于这一点,有学者已经给出了定论,“安徽行政区域内,除了三大文化圈外,还有些地区难以列入‘编制内’,如,合肥地区、六安大部分地区、巢湖一部分地区等,这些地区既不能划归淮河文化,也难圈入皖江文化,这是一个游离于三大文化圈之外的较小地域范围的文化,其内部又有着各自相对独立的文化类型。如将这些地区撮合起来,统一冠之以‘某某文化’之名,确为勉强。”<sup>[4]</sup>亳州与上述的合肥、六安和原巢湖地区大不一样,它不仅有独特的地貌特征,还有特色鲜明的文化展演进程,称之为亳文化应是理所当然。亳州历史悠久,文化厚重,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诞生、成长与发展过程,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传承体系。距今 5000 多年前的尉迟寺遗址,集中反映了我国新石器时代聚落生活生产场景,它用活的化石告诉我们,早在 5000 年前,先民们就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用自己辛勤的双手创造着丰富多彩的古代农业文化。3700 多年前,商汤在此建都,开启了城市文明的大门,并留下为民请命的“汤王祈雨”的勤政文化。春秋战国时期,亳文化已蔚然成风:亳地民歌是《诗经·陈风》来源之一;老庄哲学奠定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华佗悬壶济世开启了医药养生文化;三曹文学担起了中国文学的脊梁;唐宋时期欧阳修等大文豪相继仕亳使亳文化余音缭绕;明清时期亳州华丽转身,“小南京”雅号见证了亳州商业文化的繁盛……今天,亳州的道家文化、三曹文化、中药养生文化、白酒文化已经具有了名牌效应。深入挖掘、整理、研究亳文化不仅是历史责任,更是时代的呼唤。

## (二) 淮河文化与亳文化

作为安徽三大文化圈之一的淮河文化至今还没

有一个较为明确的、言简意赅的定义。陈立柱等学者经过长期的梳理总结,从其形成的机缘、古今变化与现代价值等方面入手,认为淮河文化是“淮河流域居民创造的历史文化,以其地理上的平旷开阔,连南接北,族群上的夷夏交互,战争融合而形成了重视和合,富有总结、反省与融通精神,尚德轻智,以做人、治世、养生为主的平原文化”<sup>[5]</sup>。但恰如作者所言,淮河文化具有“大象无形”的特点,因而确切地给淮河文化下一个定义还需进一步提炼。至于如何提炼,作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了提炼淮河文化概念的方向性建议,“我们没有在‘淮河文化是……’的方式中思考它,而是在如何去说它是合适的,以及它拥有哪些内涵的层面去认识它。”<sup>[6]</sup>之所以要另辟蹊径去定义淮河文化,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淮河流域地域广泛,涉及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甚至湖北五个省,其中包含了“商周时代的东夷(包括淮夷)文化、渦淮两岸产生的老庄文化、先秦时期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以及两汉和北宋之后南移的中原文化、明清之际兴起的淮扬文化”<sup>[7]</sup>。令人称奇的是这些文化现象能融合生长,“使得淮河流域的文化有着近乎于‘同俗并土、同气共俗’的特点”<sup>[8]</sup>。但任何事物的相似性不能取代或掩盖它的差异性,淮河文化依然。基本趋同的淮河文化特质不能取代亳文化。亳文化是淮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也深浸了中原文化,在文化特质上表现了独有的地方文化特色。古代亳州地域涵盖了今天亳州市辖区及河南鹿邑、永城等地,地处南北方交通要道,素有“中州锁钥,南北要脊”之称。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此地成了中原文化、楚文化、齐鲁文化交汇之地,在多种文化长期的碰撞中诞生了影响中国民族价值观的道家文化,催生了独树一帜的曹魏文化,孕育了顺应天时的中药养生文化。

## (三) 亳文化的空间范围

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都要在一个特定区域经历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亳文化也是这样。亳文化是历史上亳地人民在长期社会生产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

① 翁飞在亳文化研究会研究发展规划座谈会上发言:安徽的文化学界,在长期的研究中,已经对安徽区域文化基本达成大体的共识,即安徽省区内,从北向南大致可以分成三大文化圈(或三大文化版块):(1)渦、淮文化,(2)皖江文化,(3)新安江文化(或徽州文化);也可以说是三条水带出三大文化圈,而且随着从古到今经济重心的南移,文化重镇也出现从北到南的迁移。

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亳是商朝的先祖和商朝都城所在地。《墨子》《孟子》和《尚书》等历史文献均说商汤居亳。《尚书·立政》有“三亳”，晋人皇甫谧认为系三地：蒙为北亳，谷熟为南亳，偃师为西亳。据《括地志》，亳即南亳，在宋州谷熟县（今商丘市虞城县）西南三十五里，为商汤建立的商朝都城亳。根据现有的历史资料和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大致画出古代“三亳”的现代地理范围：“商丘以南二十二公里处的睢阳区高辛镇为南亳，商丘以北二十五公里处的亳（今梁园区蒙墙寺）为北亳，在商丘以西大约 280 公里处的偃师商城为西亳。除偃师外，南亳和北亳都与商丘为一地”<sup>[9]</sup>。由此亳文化研究的第一个难点就摆在了我们面前：亳文化研究的范围是什么？我们应该考证的是三亳地区的文化，还是某一个地区的文化？如果这个空间范围不能统一，那么亳文化研究就很难有真正的成果出现。我们认为亳文化研究的范围就是今天的亳州市及周边地区的文化。因为在商朝结束后，唯一以亳命名的地方就是亳州（北周大象元年，改南兖州为亳州，治所不变，亳州之名始于此），这个命名与历史上的三亳无关系，但缘何只有这个地方被命名为亳州，我们认为这与三亳中的南亳的地理范围或许有着直接的联系：南亳包括今天亳州市区及周边地区。这一点历史遗迹予以证明：今天亳州城北尚有汤王陵。再者，自商汤灭亡后，北亳、西亳之地被湮没在中原文化之中，已经失去了其独有的文化特征。因而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亳文化的空间范围就是今天亳州及周边地区的文化。这个空间界定与学者在界定徽州文化空间范围上的观点是一致的：“空间界限首先是徽州人和非徽州人在这块土地上创造的文化，其次是徽州人在非徽州地区所创造的带有徽州文化烙印的文化，三是徽州文化有形无形的影响所及地区带有徽州文化色彩的文化。”<sup>[10]</sup>

#### （四）亳文化的时间范围

解决了亳文化的空间问题，尚有亳文化的时间范围问题。如上所说，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在演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尤其是一种地方文化，如果在外来文化的浸入过程中不能保持自己的独特性，就有可能被同化、甚至消失。因此，我们在研究亳文化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时间范围。有学者指出，“南宋以后，尤其是元明清以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亳文化渐趋式

微，并逐渐趋于沉寂。”<sup>[11]</sup>综合现有的考古资料、学者研究的成果以及亳文化的历史地位等因素，我们认为亳文化研究的时间范围应该界定在新石器时代至两宋时期。因为这一时间段亳文化既有独立发展的突出特点，又有积极吸收其他文化的包容性特点。到两宋之后，亳文化已经被中原文化所同化，尽管亳文化中商业文化在明清呈现出了极其活跃的态势，但这种繁荣的时间并不长，且没有出现像晋商和徽商那样鲜明的特点。

## 二、亳文化的精神与研究内容

### （一）亳文化的精神内涵

任何一种文化能够保持经久不衰发展势头的原因就在于它有特定的精神作为支柱。何为文化精神，有学者认为，“文化精神是具有相对稳定性的东西，可视为文化的深层次结构，是民族文化的灵魂或精髓。”<sup>[12]</sup>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精神，关注并阐述中国文化精神的学者张岱年认为：“中国几千年来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的主要内涵是四项基本观念，即：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自强、以和为贵。”<sup>[13]</sup>此后，关于中国文化精神的著述日渐丰富<sup>①</sup>。这些论著对中国文化精神进一步丰富、完善，并一致认为，研究某一种文化，如果不了解她的精神内涵，那么这种研究就如同水上漂一样，永远体会不到水面下的生机盎然与暗流涌动。亳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致力于探索其精神实质，众多学者也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有学者认为亳文化精神“早在先秦时期就已表现出强势特征，表现出领袖群雄的风范，呈现出和谐创新、奋发向上的积极进取精神。”<sup>[11]</sup><sup>10</sup>这个论断是客观的，但就目前的研究事实来看，这个论断尚有完善的空间。因为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包含了众多内容，根据研究者个人的喜好、学识水平等从中撷取几个特征并不十分困难，但要用几个词来囊括整个地方的文化特征则十分困难。这是因为地方文化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静止不动的，它不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还会因为周边文化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到底该如何定义亳文化精神，有学者提出通过研究文化体系的内在结

① 如：陈来《中华文明的价值观与世界观》（《中华文化论坛》2013年第3期）、楼宇烈《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中华书局2016年版）、郭齐勇《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三联出版社2018年版），等等。



构形式来把握和显示文化的质的定性的方法值得一试<sup>①</sup>。总之,只有将亳文化的精神内涵充分展示或提炼出来,亳文化研究才会“散而不乱”,才会有真成果。亳文化精神的探索应该在重点研究其文化体系结构形式的前提下,从价值取向、精神风貌等能够提振民族精神、树立文化自信的角度切入,同时,还要注意它与淮河文化精神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精神的关系,而后一点是当前许多地方文化和地方文化精神研究中存在的最大疏漏。

## (二) 亳文化的研究内容

关于亳文化的研究内容问题,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老庄道家思想和魏晋文学。实际上,亳文化的内容很广泛。首先是原始文化。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亳州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来了解亳州地区原始居民的生存状况与生活情形,以与同时期其他地区的生活状态研究相比照。其次是道家哲学思想。关于道家思想的重要性,陈鼓应先生认为:“纵横整个中国哲学及整个传统文化史……起主要作用的则是道家。至于中国文学史、艺术史、美术史和宗教史受老庄的影响,更是远大于儒家。”<sup>[11]22</sup>也正是这个原因,关于老庄及道家研究的成果很多,而所有研究成果都绕不开生于亳州、长于亳州的老庄。第三是魏晋文学。关于魏晋文学的研究,现在已经有很多成果出现<sup>②</sup>,但不论从哪个角度去研究魏晋文学都离不开亳州的三曹。对三曹文学的研究,亳州学院的魏宏灿先生虽有多篇论文和专著,但研究只是起了一个好头,还有很多东西值得挖掘。第四是医药文化。亳州古有神医华佗,现在是有名的“四大药都”之一,在这里应该有很深厚的医药文化可以研究,但可惜的是由于资料的缺乏,对华佗及医术的研究很肤浅。因而对于亳州医药文化及相关的药膳饮食养生文化的研究空间还很大,而且研究前景广阔。第五是武术文化。亳州自古就出了替父从军的花木兰,又有华佗的“五禽戏”,有三国时期逐鹿中原的曹操,还有“六合八法拳”的创始人陈抟,他们或武艺高强或直接推动了中华武术的发展。关于这一点有学者已经做了有意义的研究探索。但亳州地区武术长盛不衰的原因以及如何进一步推广和发扬光大都值得进一步研究。第六是亳文化与中原文化、楚文化及齐鲁文化的关系。由于亳州地区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其文化的形成具有自己的独特性质,但又不排斥外来文化并能积极吸收外

来文化,“亳于古为殷汤所居之国,故其俗尚鬼,又与陈国相近,故其俗尚巫。初不闻以拳勇相尚也,后乃急疾尚气,渐染北方之强”<sup>[14]</sup>,说的就是亳文化的包容性。因而亳文化与中原文化、楚文化和齐鲁文化之间是如何互动的关系研究值得注意。除此之外,诗词、戏曲、书画以及民俗等也是重要的研究内容。

## 三、亳文化研究的现代价值

一种文化研究的根本目的和落脚点都是为现实服务。离开为现实服务这个点,所有文化研究都是毫无意义的。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提出了“文化强国”“文化强省”“文化强市”各级战略规划。就安徽省而言,已连续下发了《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的若干意见》《文化强省建设实施纲要》等纲领性文件,亳州市也相应地出台了《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强市的实施意见》,这些都为亳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与保障,也都要求亳文化研究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为新时期亳州地方社会发展服务。因此,亳文化研究的现代价值取向问题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热点之一,也是亳文化研究的根本目的和落脚点。

亳文化研究尽管起步较晚,但她汲取了其他地方文化研究与现实服务相脱节的经验和教训,从一开始就将文化研究与社会服务紧密结合。

首先是亳文化与地方民生工程建设。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亳州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如何将数千年的文明成果再现并传承下去,以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如何将道家思想中“无为而治、自然和谐”的思想融入城市建设;如何将华佗“悬壶济世、普济众生”的仁慈精神传承发扬并惠及亳州民众;如何将魏晋文学融入市民的生活以及如何更好地推动三国文化在亳州的发展等都是亳文化研究的题中之义。魏武广场、亳州博物馆、操场公园的新建或改建,已经引

① 陈伯海《中国文化精神之建构观》(载《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认为,不弄清中国文化的精神素质,就难以正确认识各种具体的文化现象,也无法预测整个文化的发展前景。但中国文化形态包罗万象,很难用几个词来囊括。而通过对文化体系的内在结构形式的整体研究,可以显示出“文化的质的定性”。

② 如:赵明《道家思想与魏晋文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5年第3期)、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何光顺《魏晋文学的自觉与反自觉》(《江淮论坛》2006年第6期)、王欣《魏晋“文学自觉”与文学场域的形成》(《苏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等。

起了民众的广泛关注,也充分体现了亳州历史文化的厚重与历史人物精神的引领作用。但亳文化与民生工程相结合尚有许多课题可做,如文化制度建设、文化服务建设、文化品牌工作等。

其次是亳文化与旅游业。随着旅游主体文化水平的提升,文化旅游成为旅游的内涵。如何将亳文化中史前文化、秦汉文化、三国文化等不同时期的文化用一条线串联起来,通过节庆活动、民族习俗、宗教仪式、祭祖敬宗等活动,将这些活动以游客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出来,特别是亳州的医药文化和三国文化,通过亳文化将亳州真正打造成旅游“药都”和“三国胜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三是亳文化与文化创意。文化创意及文化创意产业是刚刚兴起不久的一个新事物。文化创意及其产业的发展潜能无限,以北京市为例,“2016年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3570亿元,占全市GDP比重达14.3%,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北京重要的支柱性产业。”<sup>[15]</sup>而所有的文化创意及产业都是以文化为内核、为根基,没有文化的支撑,这些创意和产业就成了空中楼阁。因此,亳文化与文化创意的研究是一个急需关注的课题。

#### 四、未来亳文化研究的思考

一是亳文化研究的动因。20世纪50年代,人本主义的代表人物马斯洛认为,人为了满足自己的不同需求会产生相应的动机。其实,无论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先有需求或刺激,然后产生动机,再通过付诸行动而完成的。任何一种文化研究也需要动机。有学者在研究淮河文化研究兴起的动因时提到了地方发展的需要、历史与考古等学科研究进一步发展两个方面<sup>[16]</sup>,这个认识是中肯的,尤其是地方发展需要,几乎是所有地方文化研究兴起的首要动因。但囿于报喜不报忧的心态,许多地方文化研究者只关注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历史文化现象的研究,而对于那些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今天却不适用的内容采取了回避或割除的处理方式,使得地方文化的研究支离破碎,不成体系。实际上,文化研究有“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两种方式”,基础研究“是历史资料、典籍的收集、整理、规划、出版的工作;理论研究是指对它们的内容、价值、意义的阐述。”<sup>[17]</sup>亳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刚刚起步的研究领域,首先要做的就是基础性研究,只有将基础性研究工作做好、做扎实,从整体上把

握了亳文化,才能对其内容、价值与意义进行游刃有余的取舍与阐释。

二是亳文化的概念。概念是反映客观事物一般的、本质的特征。那么亳文化一般的、本质的特征是什么?这是一个研究亳文化绕不开的问题。但遗憾的是,尽管我们提出了“南有徽文化,北有亳文化”这样大气、高端的口号,到现在还没有哪一位学者真真切切地给亳文化下一个一目了然的定义。这其中的原因大概还是没有静下心来、沉住气从最基础的研究工作开始。如何确定亳文化的概念?陈立柱教授在探讨淮河文化的概念是否成立的思路或许对我们一定的启发意义。“一种地域或地区文化概念的成立与否”,要从四个方面去考虑,一是文化历史的积淀,二是与其他文化形态相比有无自己的特点,三是有无独特的价值观念,四是该文化内部有无共性点<sup>[6]184</sup>。亳文化的文化历史积淀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如何找出自己独特的文化特点、如何将蕴含在文化中的价值观念提炼出来,这需要亳文化研究者孜孜钻研。

三是亳文化研究的方向。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豪斯(R. J. House)创立了“目标导向”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目标实现后,应适时地提出更新更高的目标,从而使动机强度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上。该理论在文化研究中的借鉴价值在于研究者的目标要求决定了研究成果的高度。就拿淮河文化研究而言,尽管现在的研究成果已经很丰富,但也有学者尖锐地指出淮河文化研究尚处于浅层次,“很多较为隐蔽的文化现象和深层次的内容及相关问题不曾涉及”“大多研究成果属普及读物类”<sup>[18]</sup>,缺少“系统的研究成果”和“综合性研究丛书”等<sup>[16]155</sup>。淮河文化研究中的这些缺憾与没有统一的研究机构引领、没有高标准的研究目标导向不无关系。作为新生的亳文化研究,一定要借鉴已有文化研究中的不足,深入挖掘亳文化中对社会发展起重大作用的文化现象,进行下沉式研究。

四是亳文化研究的策略。就亳文化研究的策略问题,陈业新的“三时段研究策略”具有较好的借鉴价值。该策略认为,在文化研究中“适当地采用长、中、短时段的研究策略,进而对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及其特征、文化的因变与传承等进行全面的考察。”针对亳文化研究,长时段研究就是要从上古时期到今天进行宏观整体性研究,要对“各个历史时期文化的发展与衍变原因、特征、背景展开分析,以明文化发展、变化

之大势”<sup>[18]</sup><sup>132</sup>；中时段研究就是要对包括道家文化、三曹文化、中药养生文化、白酒文化等文化形态展开深入详细的研究；短时段研究则是对上述历史文化现象中具体事件进行前因后果的分析研究。这种研究策略既能从整体上宏观把握亳文化的发展脉络，又能从微观上研究透亳文化。

亳文化是淮河文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淮河文化研究已经取得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并开始向更深层次的研究领域拓展，亳文化可以借助淮河文化研究上台阶的机会，借势发力，齐头并进。具有独特地理位置、独特文化特色的亳文化研究就像一个刚刚坠地的婴儿，尽管她还有许多不明确、许多需要学习的东西，但她的快速成长是毫无疑问的。

#### 参考文献：

- [1] 范立军. 区域文化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南京社会科学, 2019(1): 61.
- [2] 谢永新, 丘上松. 恰当地把文化圈理论引进世界文学研究领域[J]. 外国文学研究, 1993(2): 118.
- [3] 王莉. 基于文化圈理论的语言圈层问题初探[J]. 新疆社会科学, 2008(1): 103.
- [4] 沈葵, 洪永平. 皖江文化的学术定位与发展契机: 兼论淮河文化与徽州文化[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3): 338.
- [5] 陈立柱, 洪永平. 淮河文化概念之界说[J]. 安徽史学, 2008(3): 100.
- [6] 陈立柱, 洪永平. 浅谈“淮河文化”概念[J]. 学术界, 2006(2): 188.
- [7] 陈琳, 陈丽丽. 淮河文化的成因与特色[J]. 江苏地方志, 2007(1): 45.
- [8] 陆勤毅, 朱华东. 淮河文化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贡献[J]. 学术界, 2015(9): 199.
- [9] 李广瑞. 商代第一都“亳”在商丘考[J].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11(2): 17.
- [10] 金开诚. 徽州文化[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0: 9.
- [11] 王正明. 亳文化概论[M]. 合肥: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2: 11.
- [12] 邵汉明. 中国文化精神[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1.
- [13] 张岱年.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J]. 党的文献, 2006(1): 94.
- [14] 中国地方志集成编委会.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 光绪亳州志[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71.
- [15] 张景华, 董城. 文化创意产业成为北京重要支柱产业[N]. 光明日报, 2017-09-12(9).
- [16] 陈立柱. 淮河文化研究的现状与反省[J]. 学术界, 2016(9): 154.
- [17] 李良玉. 关于文化研究的几点意见[J]. 安徽史学, 2007(3): 116.
- [18] 陈业新. 淮河文化研究述论[J]. 学术界, 2017(11): 135.

## Thoughts on the Study of Bozhou Culture

ZHANG Wenlu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Bozhou University, Bozhou Anhui 236800, China)

**Abstract:** To explore Bozhou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the three major cultural circles in Anhui, it should start with clarifying the scope of time and space of Bozhou culture, pay attention to its spiritual connotation, and expand its research content.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already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Huai River culture, consolidate the basic work of Bozhou culture research, refine the unique conceptual definition of Bozhou culture, clarify the research direction of Bozhou culture, and use the “three-period research strategy” to study Bozhou culture from both macro and micro aspects.

**Keywords:** Bozhou culture; regional culture; cultural circles

[责任编辑 夏 强]